

今年，一個自定為「流浪者」的紀錄片導演，拍了一部名為《四個春天》的電影，感動了萬千觀眾。日前，這位記錄者——陸慶屹，於香港書展期間開辦講座，以電影為引，探討平凡中的詩意。大公報記者在講座後請他談一談如何憑藉《四個春天》「俘獲」觀眾？面前這位導演語氣中透着質樸，淡然一笑道：「我只是一個感受者、傳遞者，與其說我是一位紀錄片導演，毋寧說我是一位記錄者。」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# 陸慶屹： 人生沒有苦難只有經歷



▲陸慶屹父母初結婚時，父親（右）為母親整理頭髮



▲二〇一七年春節，陸慶屹抓拍父母照片，重現五十三年前舊時光



大公報記者 湯艾加

生活與電影相互承載。當生活有了電影，就產生了活力；當電影表達了生活，那就多了一分真實。然而在生活與電影間，如何發掘出其中的詩意，那也是一種對於生活的浪漫體會了。最貼近生活的電影當屬紀錄片莫屬，它的魅力在於人們對於生活的真實展現。

紀錄片《四個春天》是二〇一九年華語紀錄片的一匹「黑馬」，雖是小成本製作，但主角浪漫詩意的生活，觸動了觀眾對於家庭親情的柔軟神經。影評人毛尖與《四個春天》導演陸慶屹就電影「回歸生活」與「詩意日常」展開了一番探討，分享他們對於生活、電影與詩意間關係的感悟。

春節在中國傳統裏有着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，陸慶屹用鏡頭記錄下了四個春節故鄉家裏發生的故事整理成紀錄片《四個春天》，這是重要的家庭生活記錄，更是每一個華人家庭的春節縮影，期盼、相聚、美食、歡笑、音樂、離別，交織出一首生活的詩。毛

身在異地，眷念故鄉的父母，是不少現代人的經歷，陸慶屹也不例外，作為一個資深北漂，在二十餘年的漂泊生涯中，他輾轉從事過多個職業，面對日漸蒼老的父母，他起初只是想為父母拍一部家庭影像，「二〇一五年，我正式想到要拍一部完整的電影，當時父親身體不太好，我就非常着急，回到北京之後，買了很多書，學了很多拍攝技巧。拍攝初衷只為記錄父母的影像，畢竟時間殘酷，人都會老，都會面對生與死，這是一個很崇高的話題。」陸慶屹表示。

《四個春天》是一部實打實的小成本電影，陸慶屹從二〇一三年開始拍攝影像，前前後後僅花費了八萬元人民幣，最終獲得第十二屆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錄片、第五十五屆台灣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剪輯的提名，更感動了觀眾。至於哪一個點最能打動人心？陸慶屹答曰：「其實我也不知道哪一段最能引發觀眾共鳴，拍這部紀錄片，也從未想過去感動誰，只是單純記錄父母的生活。」整個專訪過程，他都不特別剖析自己使用的拍攝技巧，反而是講起父母事跡，總有那麼多的意猶未盡，更給記者展示父母的一組老照片。

## 願意記錄自己的生活

陸慶屹曾經從一篇侯孝賢的訪談中看到一句話：「初入行拍電影，什麼都不要想，想拍什麼就去拍，不去試試怎會知曉如何開始。」這句話極大程度上鼓勵了他。不過專訪當日，他則表示：「其實並無特別的激發點令我走上拍攝之路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，更多的是來自父母基因的承傳和薰陶。」於其家庭而言，為家庭成員造像、熱愛攝影稱得上是一種傳統，父母結婚時很窮苦，但每年都會去照相館拍一次照，哪怕是在「文革」年代都留下了影像；哥哥喜歡拍照，姐姐更用第一筆工資的收入給父母買了一台DV，影片中穿插的部分影像，便是出自陸父之手。

也許，父母永遠對子女抱有某種期望，希望他們安定、結婚生子，而子女卻喜歡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再苦再累也想找

尋自身價值，故而不得不離開故土，但內心也會有一番捨不得。陸慶屹也是如此，才會在剪輯影片時，一邊看着機器一邊流淚。

他在十五歲時便離開了家鄉貴州，「我到北京那一年，還沒有北漂這個概念，當時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，但我認為父母在文藝上留給我的基因不能浪費，故鄉雖然安穩，卻並非一個可以承載文藝使命的地方，留下或是離開，這種權衡很無奈，但很符合現實，因為每一個人的生活選擇與其所處社會變遷有關。」

觀其北漂履歷，陸慶屹從事過各種各樣的工程，比如做過足球運動員、酒吧歌手、出版社編輯、礦工、攝影師等，兜兜轉轉才開始攝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創作，「面對我這樣一個喜歡折騰的人，母親十分豁達，她對我要求不高，只希望我不要違法亂紀。」事實上，雖不是科班出身，但陸慶屹是一個多才多藝之人，擅長繪畫，亦不拒絕探索新領域，而綜上種種的生活歷練也令他在光影之路上有更多的感悟。

《四個春天》按照時間順序，圍繞父母生活拍攝了四個過年場景，影片開場，一方天井、一個清澈的水池，陸慶屹的父親、母親會在水池旁一邊準備年夜飯一邊彈自唱高歌一曲；鏡頭一轉，父親在屋子裏寫着對聯，晚上團年飯後，母親和其他幾位來訪親戚還會唱上一段山歌。兩位南方老人的退休生活，雖不富裕，卻沒有荊棘叢生的日常、沒有充滿抱怨的話語、沒有屬於老年人的抑鬱和喪失希望，只有最簡單的純粹和喜樂。

## 永無止境的好奇心

「我覺得爸爸媽媽身上最打動我的就是永無止境的好奇心，以及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他們的家庭故事並不普通。」陸慶屹說。陸慶屹父親識得二十餘種樂器，片中時常可看到日光、燈光投射在他拉小提琴的背影身上，就算是整理臘腸，也會念一句「漂亮、安逸」；母親喜歡唱歌跳舞，在廚房勞動都能即興起舞。兩個人的鬥嘴也甚為有趣，父親愛好養蜂，吃完飯後就要去看一眼蜜蜂，母親就會說：「蜜蜂就好像初戀情人了。」

觀眾評價，《四個春天》傳遞出了一種詩意的日常，陸慶屹則覺得這一點源自老人家的生活態度：「他們熱愛這生活，童心未泯又十分文藝，才會對一草一木、燕子回巢、蜜蜂的處境，都充滿感知，都想要去關注。比如父親會吹走蒲公英的種子、母親會感受風的到來，彷彿他們身上從未發生過苦難，只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。」

陸慶屹稱，父母不畏苦難，能與周邊的環境融為一體，「除了好奇和熱愛生活，父母還是很能獨處的人，爸爸煙酒不沾，天生自帶『防火牆』，然而聲望極高，鄉里鄉親都喜歡找他幫忙；母親不關心社會變化，卻十分能適應周邊環境。爸爸去瀋陽待了九個月，剛走的一個星期，家中電燈泡就燒了，母親白天上山砍柴，晚上點蠟燭過火，整整九個月全然沒用過電。」

「父母的生活方式，教給我最受用的一條人生道理，即是以不變應萬變，作為一個人，一定要自強自立。」陸慶屹表示：「在他們身上，沒有苦難，只有經歷。縱使身處惡劣的生存環境，他們也能發現平凡中深藏的美，縱使曾有過吃糠嚙菜的困厄，也有頑強不屈的生命力。這種力量也深深影響了我，能夠放下對困境的情緒，從一個暴躁的人變成一個十幾年都沒有生過氣的人。」也因此，就算是在拍攝《四個春天》中最黑暗的那個春天——姐姐患癌去世時，他亦沒有一味渲染「白髮人送黑髮人」的悲傷，更沒有表現父母如何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，而是用一種很冷靜的視角，讓生活承載所有悲痛，只因日子還要繼續推進。

「記錄者」陸慶屹拍攝父母的詩意生活，因為父母努力生活，將他人都畏懼的老年生活過成了一段又一段「詩歌」，而最令他陶醉的，是記錄的過程，「歲月流逝，但因為有光影的留存，那些消失的記憶成為了永恆，繼而成為歷史的一部分。」正是這種記憶中的流逝，因為有陸慶屹的鏡頭，在父母與游子之間實現了溫情的凝視。也正是其父母身上這種「希望永在，生生不息」的溫暖力量，為我們浮躁的生活賦予了一種並不平凡的詩意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一九八九年，陸慶屹剛到北京，便愛上了踢足球



▲陸慶屹的油畫作品



▲陸慶屹父母住宅附近有一棵梅樹，每年花季的早晨，他們都會去看一會

## 生活·電影·詩意 ——毛尖陸慶屹對談《四個春天》

有的悲痛」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「用吃飯情節建構電影節奏」，這一點中在《四個春天》也得到體現。當一家人圍坐飯桌旁時，專門為離世的姐姐留出一個位置，就是真實的生活，「日常生活構成全部的生活史詩。」

陸慶屹回憶電影的拍攝初衷，源於父親早有拿攝錄機拍攝家庭錄像的習慣，所以自己也決定開始為家人拍攝家庭錄像，因「記錄能使時光留存，生活就不會輕飄飄地流失了。」這部電影用了六年的時間，四年拍攝，兩年剪輯製作。當拍攝完素材後決定製作成紀錄片，自己才正式開始學習紀錄片的剪輯與製作。然而電影中的詩意並不是刻意營造，因為「父母早已把生活過成了詩。」

《四個春天》透露出一種獨特的調性，既能捕捉到人物真實且細膩的感情，卻又有似來自陌生人的凝視。陸慶屹把這歸結於「流浪的人總是無所事事」。他認為自己就是

矛盾的結合，中學時既是「學霸」卻也是當時小城的「街霸」，直到十五歲帶著青春桀驁離家闖蕩，成了一個「流浪的人」。從那時起就開始「放下日常經驗，學會對生活凝視」，凝視間也幫助了他理解生活日常，構建出生活中真實的詩意與生活的質感。

回顧拍攝過程，陸慶屹仍有些不經意的停頓調整情緒，「有些拍攝的畫面，在鏡頭後面的我已經忍不住輕微哭出了聲，我刻意把這些隱去，剪輯的時候也很克制，希望能少用煽情帶動觀眾的情緒。」這部電影就是一個真實的家庭情感的呈現，其中的情節也會出現在觀眾日常的生活中，沒有刻意的煽情，但戳到了觀眾對親情已稍有麻木的心。故毛尖表示，這部電影中詩意浪漫的元素，有來自電影人物的真實表達，也有「來自他（陸慶屹）剪輯時的掌控力帶出的鎮定的詩意。」